

梁啟超的憾事

(本文插圖刊第7頁)

梁佩澍

梁濟、梁漱溟與梁啟超

心儀梁濟更重其子

梁濟(巨川)及其次子梁漱溟都和梁啟超有一段不尋常的關係。

梁漱溟說，他早年「受知於蔡元培先生和梁任公先生」，那自然是因研究印度哲學有成就之後的事。清末之際梁啟超曾以他的思想影響着整個中國，梁啟超可說是梁濟父子思想見解上的領袖人，梁濟父子的政治思想受梁啟超影響之深，尤可從梁漱溟所作《思親記》的記述中見出：公固關懷國家，溟亦好論時事，於是所語什九在大局政治新舊風教之間。始在光宣間，父子並嗜讀新會梁氏書。溟日手《新民叢報》若《國風報》一本，肆為議論；顧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國，漸以生乖。公厭薄黨人，而溟故祖之。公痛嫉議員並疑其制度，而溟力護國會。語必致忤，類諸於是，不勝枚舉。時局多事，倏忽日變，則亦日夕相爭；每致公不歡而罷。然意不解，則旋復理前語，理前語，則又相持當午或為之廢食，入夜則致晏寢。即寢矣，或又就榻前語不休。其間詞氣暴慢，至於喧聲達於戶外者有之。不過，後來他們都對梁啟超感到有些失望，雖然失望的緣故不同。梁濟不大為人所知，他沒有成就什麼事業

或學問，只中過舉人，在清朝衙門裏任過中級官員，是一個堅定的維新派，不要子女讀私塾，到北京最先成立的西式學堂就讀。他最關心改進社會風氣和啟發民智，全力支持好友彭翼仲先生辦報紙，兩家都把財產賠了進去，又一同提倡演新編劇本，拒演內容淫穢的劇本。用今天的話說，梁濟是一位社會活動家。梁濟教育子女的方式更是一種對中國傳統家教方式的反叛，給子女以充分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乃至行動自決。梁漱溟在他父親的影響下，十三四歲就關心國家社會，稍後他轉向孫中山先生的一派，而梁濟仍主張維新，父子二人常常為此大聲爭論。梁濟認為，只要是關心大事，有胆識有志氣，即使所見不同，完全無妨。據梁漱溟記述，辛亥年他參加京津同盟會的活動，梁濟雖明確表示不贊成却不加禁止。再後來，梁漱溟好讀佛書，志在出家為僧，拒絕父母為他議婚，梁濟的態度仍是只限於護兒子知道自己不同意而止，行動上從不加以禁止、阻攔。民國以來政局不穩，種種景象的不佳甚於清季，梁濟原是主張維新的，在這種情況下，越發感到失望。民國七年在自己生日那天，留下遺書投水自盡，他自認是清朝遺臣，決心以一死警醒國人。他的自盡和所留遺書在報紙上公布後，在

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甚至有一個人在同一地點投水，從不同觀點發出的議論更多。梁啟超從報紙上讀到後，感情上大受衝擊。殊不知梁濟生前非常敬佩他，曾經多次投書請求見面，乃至走訪於其家門而終不得如願。梁濟在所著書《伏卯錄》中記述了這件事，既慨嘆梁啟超的慢士但仍以救國的大任期望於梁啟超。

民國十四年梁漱溟及其長兄將梁濟遺書整理出版。這時梁漱溟作為後輩已和梁啟超有幾年的交往，梁啟超從報紙上知道遺書出版，正想寫信去要一部來讀，而梁漱溟已遣人將遺書送去，並附有一信，說明在《伏卯錄》中有一段關於他的話，請他揀閱。梁啟超讀過之後，寫了一封十分感動人的信。全文是這樣的：

漱溟宗兄惠鑒：

讀報知巨川先生遺文已哀輯印布，正思馳書奉乞，頃承惠簡先施，感喜不可言聲。讀簡後，更檢《伏卯錄》中一段敬讀，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許者如此其厚，而啟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無狀！今前事渾不省記，而斷不敢在他辭自諱其罪。一言蔽之，學不鞭辟近裏，不能以至誠負

天下之重，以致虛驕慢士，日儕於流俗人而不自覺，豈唯昔者，今猶是也。自先生殉節後，啓超在報中讀遺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後讀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納交之心益切。）豈知先生固嘗辱教至四五，而我乃慙慙自絕如此耶！△伏卯錄▽中相教之語雖不多，正如晦翁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其所以加惠啓超者實至大。末數語，蓋猶不以啓超為不可教，終不忍絕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願兄於春秋絮祀時，得聞為我昭告，為言：「啓超沒齒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報先生也。遺書尚未全部精讀，但此種俊偉堅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紙只字皆關世道。其效力即不見於今，亦必見於後。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繼述而光大之，則先生固不死也！」

校業草創，課業頗忙。又正為亡妻瑩葬，益卒卒日不暇給。草草敬復奉謝，不宣萬一。

啓超再拜 十月一日

梁啓超信中說「後讀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納交之心益切」，是指梁漱溟所著講佛學的△究元決疑論▽；宰平先生（林志鈞）福建閩侯人，早年留

日，自清末至民國，一直是極負清望的知識分子，先已與梁漱溟相識。民國九年的一天，他陪同梁啓超、蔣百里（方震）一同訪梁漱溟於其寓所。（北京崇文門外漢子胡同十六號，亦即梁濟所遺住宅）客人都長於梁漱溟二十歲上下，屬前一輩的人。三位受仰慕的人同車到來，確使梁漱溟萬分感動。

梁啓超在梁漱溟心目中，絕不僅是一位知名人士，而是他少年時期求學問，長見識的領袖人物。他曾這樣說：「父親放任我之所為，一不加禁，是因為相信我是有志向上，非趨下流，所以聽其自己轉變。就在這放任之中，我得到機會大走自學之路。大約從十四歲到十九歲，我心目中有幾個傾慕欽佩的人，梁任公當然是頭一個。」

起初立憲的主張自然不能在國內公開傳播，梁啓超那時在日本出版△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半月刊）。不知因什麼方便機會，梁漱溟得到了△新民叢報▽任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共六巨冊和△新小說▽一巨冊，加起來共有六百萬言。待到民國前一年，他更訂閱了在日本由立憲派主編的△國風報▽，和革命派在上海出版的△民立報▽。一個中學生而擁有這許多一般人得不到的讀物，自然促使其視野寬廣。如△國風報▽上談國會制度，責任內閣制度，選舉制度等等的文章很多，其他如國庫制度，審計制度也常談到。這時清廷迫於大勢為順應輿情，亦在醞釀着立憲，因而允許將這類內容的報刊在國內流傳。△國風報▽即是梁啓超一派的機關報，在當時隱然居於領導地位。梁漱溟對這些政治運動和近代國

家法制十分關心，吸取了許多知識見解。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憲派的容易得到，但梁漱溟還是設法得到一些。如有△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一厚冊，是將梁啓超、胡漢民、汪精衛爭論中國應採行任何制度的文章合印而成。據梁漱溟說，他「反復讀之甚熟。當時饑饉其中者約三四年，是比我讀五年中學更豐富而切實的教育」。

建設鄉村改造中國

但是梁漱溟接受梁啓超的思想指導也便止於此時了，他很快轉向革命派參加京津同盟會，在清廷遜位之前曾和同志建立秘密製造手榴彈的地點。待到民國九年兩人相識時，梁漱溟的思想已經又從革命派轉入佛家出世思想。民國十八年，梁啓超在北京病逝，梁漱溟正在廣州，而且已經發生再次思想轉變，認為中國不宜實行西方議會制，而應走自己的路——從建設鄉村入手改造中國社會。

對於梁啓超在五十歲時逝世，梁漱溟說，他「心中好大難過」。因為「相交以來，過承獎愛，時時商量學問」。梁啓超對這位後輩，虛心咨訪，凡寫關於佛教的文章，總是以初稿送給梁漱溟徵求意見。他覺得對梁啓超的厚愛未有以報。以什麼為報答呢？他認為梁啓超「奔走國事數十年，所以求中國問題之解決者甚切，而於民族出路何在，還認不清。第二，任公先生自謂服膺儒家，亦好談佛學，在人生問題上誠為一熱心有志之士，而實沒有弄明白。我於此兩大問題漸漸若有所窺，亟思以一點心得，當面請正。豈料先生竟

作古人，更無從見面談心，只有抱恨無窮了。話雖說得委婉，實際上這位後輩覺得梁啟超在兩大問題上都沒弄通，很自信地想要說動他。此外，梁漱溟還認為梁啟超在民國以後政治上有所失誤。對這個問題也坦率地講出來。由此看來，梁漱溟對所欽佩的前輩人物，不採取為賢者諱的態度，而是力求實實在在地說話。

聲光遠超過康有為

民國卅二年梁漱溟在桂林時，友人為紀念梁啟超逝世十四周年，約他寫一篇文章作紀念，寫得懇切而實在。其主要段落頗值得一讀，茲節錄如下：

「欲知任公先生的偉大，須同其前後同時人物作一比較。例如蔡（元培）先生即其前後同時人物之一。兩位同於近五十年的中國有最偉大之貢獻，而且其貢獻同在思想學術界，特別是同一引進新思潮，衝破舊網羅，推動了整個國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於蔡先生八歲，論年齡稍後，而其所發生之影響却在前。……在距今卅五年前後的中國政治，全為立憲運動所支配。……當他的全盛時代，年長的蔡先生却沒沒無聞。蔡先生從五四運動打出來他的天下，那是距今廿四年的事。……當任公先生全盛時代，廣大社會俱受他的啟發，……康氏原為任公之師，任公原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但是不數年間，任公的聲光遠出於康氏之上。但須注意者，他這一段時期並不長，象是他登台秉政之年（民國二年，六年兩度），早已不是他的時代了。再進到五

四以後，他反而要隨着那時代潮流走了……。

「其出現如長慧燭天，如曇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響絕，政治學術兩界胥不發生綿續之影響。此正任公之特異處。……任公的特異處，在感應敏速，能反皇於外，傳達給人。……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不能綿歷久遠」。

梁漱溟還把梁啟超、蔡元培二人做了有趣的比喻，說「從前韓信和漢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個善於將兵，一個善於將將。……蔡先生好比漢高祖，他不必自己東征西討，却能收合一批英雄，共圖大事；任公無論治學和行文，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自己衝鋒陷陣，所向無前。他給予人們的影響是直接的，為蔡先生所不及」。

兩大憾事晚年深悔

梁漱溟還認為，梁啟超學術上的成就，量過於質，而政治上則頗有可抱憾的事。他舉出兩件事：民國成立，宋教仁想實行政黨內閣制，這一設想和梁啟超相合，當時兩人曾約定共同實現之，可惜宋教仁遇刺，革命派與立憲派合作的機會遂失。加以袁世凱多方籠絡立憲派，終至於形成立憲派組成進步黨和國民黨相對立的局面。而後熊希齡受袁之命組閣並副署了袁氏解散國會的命令，這個責任是推脫不掉的。這應看作梁啟超政治上第一次大失敗。雖然在這之中梁啟超只負一部分責任，却是春秋責備賢者，賢者亦應引咎自責。但是由於知悔，在倒袁行動上，梁啟超盡了最大的力量。

第二件錯事是，張勳復辟失敗，段祺瑞梁啟

超攜手執政，但竟不肯恢復國會而另新造國會，以致破壞法統，引起護法之役，陷國家於連年內戰。這次錯誤別無可諉，只能由梁啟超負責，這和前一次錯誤，別人（如袁）負有更多責任還不一樣。當然，從此梁啟超的政治生涯也就告終了。梁漱溟寫文章紀念梁啟超，指出他政治上兩度重大失誤，從秉筆直書而言，自當如此，只是心情上頗有不得已而為之的意味。因而寫道：「我受先生知遇，終身銘感，右方言論質直，正是不敢有負先生垂愛之厚意」。

所效之勞不足償孽

多年後，梁漱溟在詳讀《飲冰室合集》時，不勝欣喜地發現，梁啟超晚年已深深知悔自責。於是摘錄下兩段文字，書於卅二年《紀念梁任公先生》一文的原稿之後。本文現亦轉錄於此。

在《吾今後所以報國者》一文中，有這樣的話：「吾嘗自謂，吾所效之勞，不足以償所造之孽」。

又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平民教育社講演中，極痛切地說道：「別人怎樣議論我，我不管。我近來却發現了自己一種罪惡。罪惡的來源在那裏呢？因為我從前總拋不掉賢人政治的舊觀念，始終想憑藉一種固有的勢力來改良這個國家，所以和那些不該共事或不願共事的人共過事，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做壞事，我良心上無限痛苦，覺得簡直是我間接的作惡」。

梁啟超的自責可謂十分痛切，而這樣的自責，在深深敬慕他的梁漱溟看來，想必感到欣慰。

這正是秉持儒家精神所應做到的。

鄒平父老愛梁漱溟

歲月匆匆，梁啟超和梁濟父子都作古人。

梁啟超墓在北平香山脚下，從通往香山公園

大道往東半里地，越過小山崗便見一片松林，地勢由北向南呈斜坡狀，其最高處便是梁啟超墓，

墓高丈餘，為其子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所設計，兼

有中西風格。往下另有梁啟超子侄輩墓葬數處，均僅有墓碑而不成墳丘。因中共講近代史對戊戌

變法持肯定態度，梁啟超墓在文革中幸未遭破壞

。

梁濟歸葬北平南郊王佐鄉祖墳。而梁漱溟墓則遠在山東鄒平縣。鄒平父老念他當年辦鄉村建

設研究院時為鄉里做了一些好事，特在城南黃山

之陽，劈山為小片平地，在一巨型石匣中安放骨灰。其後面為黑色大理石一面，上鐫有梁漱溟

先生生平述略，共八百餘言。又在墓的兩側建

房一所，由專人維護整潔。無疑，這裏是他最理

想的安息之地。

八十年十二月廿二日

故國河山長聯佳句（四十二）

章喜元輯

天師洞客室

福地證因緣，萍水相逢，誰是主人誰是客？
名山推管領，蒲團靜坐，半成隱士半成仙。

天師洞客室

溪上玉樓樓上月；
城外天林林外山。

天師洞靈祖樓

明月三更映綠水；
青天一色駕紫雲。

天師洞齋堂

掃來竹葉烹茶葉；
劈碎松根煮菜根。

天師洞齋堂

事在人為，休言萬般都是命；

境由心造，退後一步自然寬。

天師洞銀杏閣

野寺多情留客住；
青山無語看人忙。

銀杏閣

獨剪西窗，梅開東閣；
尊飛北海，月滿南樓。

天師洞西客室

聖人如碧梧翠竹；
斯文是仙露明珠。

天師洞西客室

小院回廊春寂寂；
碧桃紅杏水潺潺。

天師洞西客室

此處勝蓬瀛，尋個中景物，

須領略蕙谷清風，鑒湖明月；

今朝臨絕頂，睹劫後河山，

最難忘劍門烽火，巫峽波濤。

天師洞長嘯樓

二三夜暢飲，青城酒醉，月明山如畫；
半響聞清談，丹室情符，心印歲同庚。

天師洞長嘯樓

清風明月本無價；
近水遠山皆有情。

青城山建福宮

一樓和氣看山笑；
半榻禪心印月明。

青城山建福宮